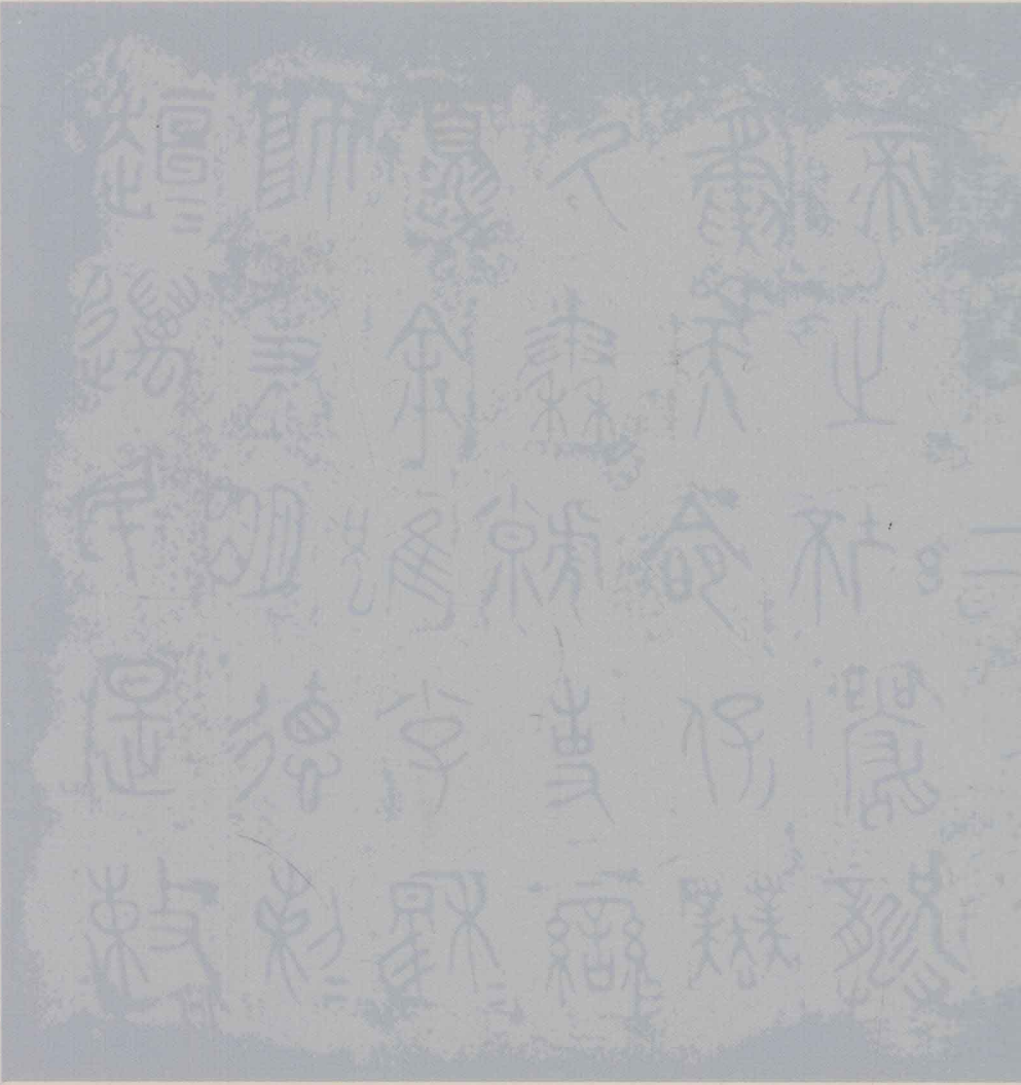




New 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Inscriptions and Manuscripts

中国古文字学导论

[美]夏含夷◎主编 本书翻译组◎译 李学勤◎审定

中西書局

New 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Inscriptions and Manuscripts

中国古文字学导论

[美]夏含夷◎主编 本书翻译组◎译 李学勤◎审定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文字学导论/[美]夏含夷主编;《中国古文字学导论》翻译组译. —上海:中西书局, 2013. 8

ISBN 978-7-5475-0375-1

I. ①中… II. ①夏… ②中… III. ①汉字—古文字学 IV. ①H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1995 号

本书出版得到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



中国古文字学导论

[美] 夏含夷 主编

本书翻译组 译 李学勤 审定

责任编辑 李碧妍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5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375-1/H·011

定 价 48.00 元

献给 何四维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序

李学勤

人们对富于神秘色彩的古文字，总是怀有浓厚的兴趣。记得过去苏联杂志《知识就是力量》曾将古文字的释读列为“最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之一。介绍世界上种种古文字的书籍，在国外相当多。前些年流行较广的一本通论性质的，是格勒伯(I. J. Gelb)的《文字研究》(*A Study of Writing*)，国内颇有人引用。这本书是1952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初版的，修订本出于1963年。类似而更新的，可举出森纳(Wayne Senner)主编的《文字的起源》(*The Origins of Writing*)，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我在以往小文中向读者推荐过。

对比上述两书，可以看出中国古文字进一步受到重视的趋势。格勒伯的书，不过简略提了一下中国古文字，而森纳的书里，就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教授关于中国文字的专篇，和古埃及文字、楔形文字等等并列，给中国文字以应有的地位。这也反映出，中国古文字的研究不像过去只有中国、日本学者从事了。但是西方人学习中国古文字还是不很容易的，比学古埃及文字、楔形文字等要困难得多。例如想学古埃及文字，不难找到像伽迪纳(Alan Gardiner)《古埃及文法》(*Egyptian Grammar*)这样的读本，学中国古文字，就缺乏导读性的好书。

现在终于有了一本用英文写的书，对中国古文字进行系统的介绍论

述,填补起西方读物中这方面的空白。这本书,我觉得是应该向国内读者推荐的。

我说的是芝加哥大学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主编的 *New 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Inscriptions and Manuscripts*,可直译作《中国古史新资料:铭文、写本释读导论》,1997年古代中国研究会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东亚研究所出版,列为其“古代中国专刊”的第三种,全书共316页。

大家了解,国内学者讲的中国古文字学,不仅研究考古发现材料的文字本身,还要探讨文字内涵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夏含夷教授主编的这部书,以铭文、写本为古史资料,主旨正与中国古文字学一致。从这一点看,赵平安、刘乐贤等教授主持翻译这部书,将标题改为《中国古文字学导论》,也许更适合于国内的读者。

《导论》开头有夏含夷写的导言。他以简洁的文笔,概述了中国古文字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19世纪末甲骨文得到鉴定以来各种重要古文字材料的发现。他说:“本书所介绍的古文字材料,都是经过了两三千年之久才重见天日,我们希望读者能阅读这些既古老又新奇的材料,和我们分享激动的心情。不管在量上还是在质上,它们都会扩大和加深我们对古代中国的认识。”

在导言之后,有按古文字材料类别分述的八篇,执笔者均为该领域的权威学者。吉德炜写《商代甲骨文》,他曾著有《商史资料集》及许多专论甲骨的文章。夏含夷写《西周青铜器铭文》,曾著《西周史资料集》和若干金文方面论文。写《东周青铜器铭文》的马几道(Gilbert L. Mattos),有《秦石鼓》专著。讲侯马、温县盟书的罗凤鸣(Susan R. Weld),对盟书也有长时期研究。出版过有名的《汉代行政记录》的鲁惟一(Michael Loewe),在书中讲汉代竹木简文书。《通报》前主编,著有《秦律遗文》、《汉律遗文》的何四维(A. F. P. Hulsewé)讲秦汉法律文献。有不少论文讨论古代数术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讲战国秦汉有关数术的简帛材料。专门研究过帛书《老子》的鲍则岳(William G. Boltz),论有传世对应本子的简帛典籍。这些位作者,在西方均不愧为一时之选。

《导论》的策划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古文字排印不易,出

版的过程比较缓慢,书中引用考古材料的下限是1993年。作者之一的何四维没有能看到书的出版,所以编者决定将本书题献给他,并加上一句话:“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部《导论》的特殊价值,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通过这部书可以了解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文字的现状。书中叙述了很多中国学术界的成果,但也着重谈到外国同行的研究,有些是国内不容易接触到的。我们还可以从书后参考文献中得到西方、日本及我国港台地区有关论作的信息。

其次是认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文字材料的观点和方法。例如书的导言强调,与传统的史籍记载不同,出土的古文字材料更多地反映古代中国人们的日常状况和流行信仰,使大家看到当时生活是怎样丰富多彩。在这一类问题上,西方学者的工作很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书中主张对古文字材料进行全面的研究。如吉德炜在谈甲骨文时便说,任何卜辞都不能孤立地研究,必须从文字、占卜、语言、文化等角度去全面考察。现代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必须时刻牢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商代人占卜时认为他们自己是在做什么?

国内读者还可以由《导论》得到一种益处,就是如何翻译中国古文字学特有的名词。现在国内不少书刊有英文的目录或提要,碰到与古文字有关的词常是一个难题,译法每不规范。《导论》在这些地方下了很大功夫,对于我们的译者颇有参考价值。

中译本序

夏含夷

首次见到本书中文翻译的初稿之时，加州大学教授吉德炜说是有点像小孩子教祖母怎么样吃鸡蛋一样，不但没有必要，并且相当可笑。现在译稿全部校对完毕以后，也许依然不知道是否有必要，但是可以肯定结果并不可笑，不但吉德炜教授这样认为，我们所有的作者也都同意。祖母当然很会吃鸡蛋，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的鸡蛋烹调法。在这本书里，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提供的就可能是一个新的做法。

写在前面，有两件事情应该提出。我们 1988 年开始初步地设想这本书的时候，中国考古学界经过 20 世纪 70 年代史无前例的发现以后刚刚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以为是个好机会把考古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介绍给众多的西方汉学家。我们一点也没有想到 90 年代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古文字方面的发现，会比 70 年代地发现更了不起。由于各种编辑和印刷的问题，这本书到 1997 年才终于问世，而当时已经有不少新史料无法编入。又拖了四五年以后的中文译本更是落伍的，希望中国读者能够原谅。

我们也希望中国读者能够理解这本书原来的目的完全是介绍性的。为了将新史料介绍给西方读者，我们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古文字资料来翻成英文，以便说明古文字学的学术方法。现在这本书翻成中文，直接利用原来的释文，并没有再加白话的翻译，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在中

文译文中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应该说明的是原书的许多细节都是在古文字资料的翻译中阐述出来的。

于此,我们对中文翻译者表示非常诚挚的谢意。这次做又中又西的煎蛋卷,我们小孩们都学了不少,希望也合乎祖母的口味。

2001年6月1日于芝加哥

致 谢

夏含夷

本书构思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在这十年中,中国考古学相对平淡——至少和 70 年代那些非凡的发现相比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的相对平静伴随着不断发展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在前一个十年中发现的新的文献资源的基础上取得的,尤其是借助于中国 1979 年以后各分支学科的飞速发展。这一切为我们得以估计该领域的发展态势及把该领域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介绍给其他人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我们没有预料到(或者我们也许预料到了,然而却还是选择了贸然前进),像这样一本充满了须专门制作的关于古代中国文字的书籍的出版,会比甚至是最专门的学术书籍花费更长的时间。现在,六七年过去了,在本书最终即将付梓之际,我很高兴向所有的撰稿人致以谢意。作为西方学术界起领导作用的权威,他们不仅就各自所精通的领域作了精彩的介绍,而且他们还以不变的合作精神和永恒的耐心参加了编辑修改、校对和其他为本书的完成所必需的琐碎的工作。由于长期艰难的出版过程使得我们不能顾及在最近两三年报道的许多重要发现(实际上,除极个别情况之外,收入任何 1993 年之后出版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的耐心尤其值得尊敬。

我们想向李学勤、约翰·梅杰(John Major)、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和钱存训为在本书撰写这些年中的建议和支持致以谢意。我们感谢大卫·塞纳(David Sena),他编写了目录;感谢蔡芳沛,他

制作了古代汉字；还要感谢鸟迹出版社的大卫·古德里奇(David Goodrich)，他承担了本书影印件部分的制版工作。我们还很高兴向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委员会对影印件制作的支持表示谢意，向“蒋经国基金会”为国际学术交流而承担此书出版费用的援助表示谢意。

在本书得以完成之前，撰稿人之一何四维去世了，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所有其他撰稿人和我一起把此书奉献给何四维教授，以示纪念。

(陈剑 译)

目 录

序	李学勤	1
中译本序	夏含夷	1
致谢	夏含夷	1
前言	夏含夷	1
第一章 商代甲骨文	吉德炜	17
第二章 西周青铜器铭文	夏含夷	64
第三章 东周青铜器铭文	马几道	89
第四章 侯马和温县盟书	罗凤鸣	124
第五章 汉代简牍行政文书	鲁惟一	158
第六章 秦汉法律写本	何四维	189
第七章 同自然哲学和神秘技术有关的战国秦汉写本	夏德安	216
第八章 马王堆帛书及其传世本之比较	鲍则岳	244
推荐书目		275
索引		296
附录 部分人名、刊名对译表		336
后记		342



图表目录

表 格

表 1	20 世纪 70 年代秦汉简帛的重大发现	15
表 2	商代甲骨卜辞的断代和年表	20

图 版

图 1a	腹甲正面;《丙编》8.1—2	21
图 1b	腹甲反面;《丙编》9	22
图 2a	卜辞释读;《库方》1595 正面(摹本)=《英藏》886 正面(拓本)	23
图 2b	卜辞释读;《库方》1595 反面(摹本)=《英藏》886 反面(拓本)	24
图 3	卜辞释读;《缀合》78	27
图 4	断代,祭祀和礼仪;《乙编》7767(摹本)	28
图 5	命辞的语气;《缀新》660	29
图 6	断代;《续存》2.972(摹本)=《合集》39393(拓本)	30
图 7	生育;《丙编》247.1—2	37
图 8	卜辞释读;《缀新》492	38

图 9	命辞的语气;《甲图》15(=《合集》20098)	39
图 10	卜辞释读;《丙编》207.3	40
图 11	“土上史寅卣”铭文拓本	72
图 12	“即簋”铭文拓本	78
图 13	“善夫山鼎”铭文拓本	80
图 14	“楚王畬章钟”铭文拓本	98
图 15	“楚王畬章钟”铭文摹本	99
图 16	“王子午鼎”铭文摹本	102
图 17	“中山王𧚲大鼎”铭文摹本	107
图 18	“秦公簋”铭文拓本	115
图 19	“秦公钟”铭文摹本	116
图 20	“新郢虎符”铭文拓本	121
图 21	侯马盟书 3.1,3.2,3.3,3.5,3.9,3.10 的摹本	132
图 22	侯马盟书中“腹”字的异体	134
图 23	侯马盟书 1.9 的图版和摹本	140
图 24	侯马盟书 156.20 的图版和摹本	145
图 25	居延汉简中的账簿	168
图 26	居延汉简中的邮书记录	176
图 27	居延汉简中的吏贲直簿	180
图 28	居延汉简中的巡视报告	184
图 29	睡虎地秦简《效律》摹本(部分)	197
图 30	睡虎地秦简《贼死》简	201
图 31	居延汉简中的烽火报告	209
图 32	甘露二年(前 52)丞相御史书	212
图 33	“人字(人生子)”篇	230
图 34	夏德安摹写的“人字(人生子)”篇	231



夏含夷

对中国悠久的文献传统的研究常常从公元前 213 年秦始皇帝（前 246/221—前 210 在位）的“焚书”事件开始。据信这一事件摧毁了绝大部分中国最早的文献遗产。不论损失的实际程度如何^{〔1〕}，在紧接其后的王朝——汉朝（前 206—220）的学术史中，重新建立古代中国的文献记载的努力成为了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而且在后代成为构成关于这一时期的许多学术研究的基础主题。重建这一遗产的要求甚至早在秦尚未统一中国时受到教育的那一代学者去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大约在汉文帝（前 179—前 157 在位）时期迈出了第一步。当时，朝廷接受了一位名叫伏胜的老学者设法保存的《尚书》的部分抄本。伏胜在秦朝时就已经是公认的学者了。他所使用的传本是用当时的隶书（即“办事员的字体”）书写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种传本通常被称作《尚

〔1〕 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在其奏章中建议“焚书”，以禁止各国的史书（秦国自己的除外）和显而易见已成为经典的《诗经》与《尚书》，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但是允许诸如关于医药、占卜、农桑这类实用性书籍的存在。关于这封奏章，参见《史记》（重印于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卷八七，页 2546。以下除非特别加以说明，所有关于正史的参考资料都依据中华书局版本。

书》的今文本^{〔2〕}。很快,其他人开始从私人收藏中搜寻文本,据说,他们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来形成这些书籍的完整抄写本^{〔3〕}。此后,也经常有记载在古建筑的墙内发现了其他文本,通常是用先秦的“科斗文”或“古文”书写的^{〔4〕}。同时,附着于各种载体的文献都受到了注意。汉宣帝(前73—前49在位)统治时期,由于洪水的缘故而发现了一件载有铭文的青铜器,于是当时的又一位首席学者张敞(卒于公元前51年)被传召来辨认朝中无人认识的古代文字^{〔5〕}。

对古代文献的重视并未随着汉王朝的结束而消逝。就在汉亡五十多年

〔2〕 据传说,在秦朝禁书的年代,伏胜在今山东济南附近他家中的墙里藏匿了写在竹简上的《尚书》抄本。秦朝灭亡后,他又使这些竹简重见天日,但原来的全本中只有二十八篇(依某种算法,也可以说是二十九篇)字迹清晰。伏胜最终就是把这一部分手抄本(通常分为三十一或三十四篇)献给了汉王朝。此后,朝廷承认其为这一经典的正统版本。关于这一传说,参见理雅格(James Legge):《中国经典》卷三:《书经:历史文件之书》(*The Chinese Classics, Volume III: The Shoo King or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原印于1865年;重印于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60年)前言页15—19。关于《尚书》版本的历史及其与古文字学的关联的进一步讨论参见后文,注4,注16。

〔3〕 班固(32—92)叙述了在公元前2世纪末,两位汉朝王子刘德(卒于公元前129年)和刘安(卒于公元前122年)在购买古书手抄本方面的作用。

(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献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见班固《汉书》卷五三,页2410)

〔4〕 据记载,用古文字书写的文献是在约公元前150年、在位于今山东曲阜的孔氏旧宅内进行的一次翻修工程中首次大量发现的。在这些重见天日的文献中,有一部包括完整的五十八篇的《尚书》抄本。除了伏胜在此之前保存的二十八篇之外,这一传本还包括十七篇其他的内容。然而,当孔安国(卒于约公元前100年)将其进献给汉武帝(前140—前87在位)朝廷之后,这一传本却并未得到承认和流传,最终亡佚了。现存的孔安国《尚书》是公元4世纪的赝品。围绕这一传本的争论,参见理雅格《书经》,页22—46;及洪业《公元719年唐代宫廷的目录学之争》(“A Bibliographical Controversy at the T'ang Court A. D. 719”),《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 (1957),页99—104、113—117。

〔5〕 参见《汉书》卷二五下,页1251。对这一发现的讨论及伴随着的对铭文的再认识,参见巴纳(Noel Barnard)《文献资料中有关青铜器发现的记载:中国历史编纂学评议》(“Records of Discoveries of Bronze Vessels in Literary Sources — and some Pertinent Remarks on Aspect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Th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6. 1 (1973),页455—544,尤其是页466。

之后,盗墓者偶然发现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古代地下藏书之一。公元 279 年,在汲郡(即今河南省北部的汲县),一座古墓——显而易见是魏襄王(前 318—前 296 在位)之墓——被盗了,出土了成千上万写有古代文字的竹简^[6]。这一发现引起了晋武帝(265—289 在位)的注意,他依据汉朝先例,指定了当时的许多杰出学者负责整理这些竹简的次序,把古文字体改写为当时的楷书字体,从而形成了这些文献的完整抄本,存入皇家藏书馆。在这些整理出来的文献中,有一部编年史(因此通常叫作《竹书纪年》),记载了夏(约前 2000—前 1500)、商(约前 1500—前 1045)和西周(前 1045—前 771)王朝以及东周时晋国和魏国的历史,它使得在此之前历史记载中的许多错误得以修正^[7];还有一部《易经》,据说与当时所存的各种传本极为相合;一部《穆天子传》,对周穆王(前 956—前 918 在位)的旅行作了广泛的描述,包括对他在昆仑山西王母宫廷所受接待的描述^[8];此外还有几部关于穆王的生活、罗曼史的短篇传奇及其他各种内容混杂在一起的文献。尽管所有的竹简都未能保存下来,甚至抄本的流传也经常是成问题的,然而真正得以幸存下来的部分则可列于公元前 4 世纪以来最有价值的历史及文献资料之中。

[6] 《晋书》卷三《武帝本纪》(页 70)中对这一发现有简短的记载,把时间确定为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十月。同书的其他地方(在《束皙传》中[束皙,261—300];卷五一,页 1427 以下)对这些出自古墓的文献有更为详细的叙述,并把起始时间定为两年以后的 281 年。关于对这一发现及来源于这一发现的文献的综合性讨论,参见朱希祖《汲冢书考》(原印于 1939 年;重印于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

[7] 关于《竹书纪年》的使用方便的文本和译本,参见理雅格《书经》,前言页 112—176。关于在某种程度上这部文献改变了对古代中国的历史记载,参见刘知幾《史通》(《四部备要》本),16.4a-b;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印于 1955 年;1983 年第二次修订版),页 585—592;刘殿爵《孟子》(Mencius)(Harmondsworth:企鹅丛书,1970 年),页 205—213。关于这一文献的可靠性,参见吉德炜《竹书纪年及商周纪年》(“The Bamboo Annals and Shang-Chou Chronology”),《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8.2(1978),页 423—438,及夏含夷《竹书纪年的真伪》(“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Bamboo Annals”),《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6.1(1986),页 149—180。

[8] 关于《穆天子传》的译文和论述,参见郑德坤《穆王行记》(“The Travels of Emperor Mu”),《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杂志》(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63/64(1933),页 124 以下,64/65(1934),页 128 以下;及雷米·马蒂厄(Rémi Mathieu)《穆天子传:译注、考证研究》(Le Mu tianzi zhuan, Traduction annotée, étude critique),《高等汉学研究所学报》(Mémoire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9(巴黎:法兰西学院高等汉学研究所,1978 年)。